

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

林世田 刘波

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使南迁存沪的善本古籍免遭日寇劫掠损毁,将存沪善本的精品分装102箱,伪装成替美国国会图书馆采购的新书,几经周折,转运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事件,当时得到政府嘉奖;此后迄今,更深受史家与相关机构的关注。

然而,由于当时事情进行极为机密,原文件史料保存不多且甚少披露,因而学界在事件过程的某些细节上有一些疑问,且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一、此前关于平馆善本运美的记述与研究

关于善本书运美的过程,现今硕果仅存的当事人钱存训先生,所著《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①及相关论述^②,为最直接可信的重要史料。

运美善本书迁台之后,台北“中央图书馆”主持点核的昌彼得先生,对目录清单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要有:一,平馆存沪未运美的善本书800多种,仅280余种见于1942年运返北平的书目,另五百余种下落不明;二,平馆运美善本书中,部分与装箱清册不符,原装箱目未载而后增的书,多为每种中之一册,且部分不够善本标准^③。他进而推测,“这些下落不明的善本,很可能已经有些化公为私了”,文末又“附带提醒”海内外图书馆在收购善本书时多加留意,“不要轻易购进赃物”。昌先生另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

①这一事件的经过,参见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传记文学》1967年第10卷第2期。转载于:《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台北商务,1967年,第114—118页;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32—1336页;《中美书缘》,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资讯公司,1998年,第65—76页。收入《中美书缘》者增入《附记迁台经过》,参考价值更高。

②钱存训先生在《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我和国家图书馆——在北图工作十年的回忆和以后的联系》(《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3期)中,均有专节回顾此事,其内容与前文基本一致。

③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书目季刊》1969年第4卷第2期。收入:《蟬庵论著全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第446—456页。

目》，著录所谓“下落不明”的宋元明刻本、抄本及名家批校题跋本 573 部，“以供‘光复’大陆后查索的参考”^①。包遵彭先生为《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作序，即全盘挪用昌先生的说法^②。这些评论在海内外图书馆界影响巨大，不仅是对善本装箱运美过程的质疑，更是对当事诸公人格上的莫大侮辱，然而长期以来北京图书馆方面并未正面回应。

朱红召先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运送美国保存经过述略》一文，为大陆首篇综述这一事件的学术论文，该文最后一节提出五处悬疑：运美善本书的确切箱数、种数、册数难以考证；实际运出的 102 箱中，有 2 箱无清单，无法核对并确认是否运到台湾；北平图书馆甲库书目有 800 余种不在台湾的点验目录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胶片的善本书中，有二十几种未见于装箱清册，运返书目中亦无记载；最后一批善本书的运送过程蹊跷^③。朱文所述悬疑，主要来自钱存训、昌彼得先生的论述。

2009 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对此事件的过程有简要记述^④，但限于体例，没能详细考辨相关细节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中，曾指出台湾、日本等版本学家曾经怀疑没有运送到美国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遭到部分散佚，是当年他们对 1959 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收录原则缺乏了解的结果^⑤，正确地指出了造成误解的部分关键原因。不过，此文并非专为此事而撰，未就相关细节问题展开讨论。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试图进一步发掘史料，并结合其他材料，进行辨析，藉以厘清部分问题。

二、装箱清单及其内容辨析

现今考察运美善本书，当日的装箱清单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1942 年 10 月 27 日袁同礼馆长呈文教育部，报告善本书运美事宜，其中提到装箱清单：“其业经运美之书目，原已编写同样四份，二份随书带美，一份存沪，一份由港

①昌彼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70 年新 3 卷第 2 期。收入：《蟬庵论著全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 年，第 457—484 页。

②国立中央图书馆编：《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中央图书馆，1969 年。转载于：《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1337—1339 页。

③朱红召：《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运送美国保存经过述略》，收入《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朱文在南运存沪善本书的具体存放地点等某些细节问题上作了大胆的推测，但部分推测有违事实，此不详辨。

④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善本南运存沪事见第三章第八节（第 98—102 页），运美事见第四章第四节（126—128 页）。

⑤《旧京书影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8 页。

转渝,以供呈报钧部,不意原件甫经带至香港,即遭沦陷。”^①这里提到的四份清单,除沦陷于香港的一份外,其他三份至今尚存。

此前披露的装箱列表,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存的二份复写件之一,载录100箱。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存有另一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②,亦即袁同礼报告中所称存沪的一份,载录102箱^③。此目分上、下两册,明显曾经改装:上册扉页后,即为“第一百箱”的清单,著录善本书四种,末行题“一百箱完”,版心处写页码“一五一”;其中《太平广记》册数原标为“四十六”,而圈去“六”字,改为“八”;页边未钤印。下册第一五一页,“第一百箱清单”之后,即接抄“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该页《太平广记》一书著录为“四十八册”,册数无误;该页末行原亦有“一百箱完”字样,后擦去并覆盖其他文字,但字迹仍然依稀可辨;“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共七点五个半叶,其字迹明显与前一百箱不同;前一百箱的清单用纸为蓝格稿纸,而“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除起首的一个半半叶接抄于蓝格稿纸上之外,后六个半叶均抄写于无格白纸上;前一百箱清单的两叶接缝处,均骑缝钤“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朱文方印,而“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并无此印。

此目上册扉页另题“卅年三月装 此目用复写纸写三份寄交袁馆长分存备案”;上册首页题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下,署“三十年三月装一百箱”;下册扉页另题“卅年三月装”;下册末页题“以上共计一百零二箱二千九百五十四种二万零九百七十册 民国三十年五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管员李耀南编造”。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当时上海办事处装箱的经过:1941年3月,上海办事处将精选善本书分装100箱,并写定清单上下二册,复写四份;抄写完成后,发现最后一页(即第一五一页)《太平广记》一书误记为“四十六

①此文见《教育部长陈立夫致行政院孔副院长折呈(1942年11月14日)》所引袁同礼密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5页。

②此为卷端题名。此目扉页(实为原始封面)题《装善本书一百箱目录》。封面题名《国立北京图书馆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籍装箱清册》,为晚近整理时加装新封面后所署。中国国家图书馆历史上曾两次使用“国立北京图书馆”的馆名:第一次是为1942年1月2日至1945年10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接收留在北平的馆舍、馆务,改用此名;第二次为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封面题名直书“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似伪政府时期语气,表明封面当为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期间整理时所加。

③1942年10月27日袁同礼馆长致教育部的密呈中称“共计分装一〇一箱”(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第604页),与实际箱数不符。有两种可能,一为袁同礼记忆疏忽,将102箱误记为101箱;二为档案整理时手民之误。该书手民之误屡见不鲜,如第604页将“中国旅行社”误录为“中国施行社”,即其一例。揆之情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惜该书未刊布档案图版,未能核查。

册”，遂圈改为“四十八册”，并重抄该页，而将圈改之页存于卷首，以昭慎重；缮写完毕后，于全目骑缝处加盖“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朱文方印；至1941年5月，增加的书籍选出并装箱，遂将清单原件下册最后一页末行“一百箱完”字样擦去，将新增清单列表接抄于“第一百箱”之后；蓝格稿纸仅余一个半半叶，不足以抄完清单，遂以白纸接抄；续补部份清单，未加盖骑缝章；这一过程为李耀南先生经手。

以上关于装箱过程的推测，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王重民先生于1941年2月离开旧金山回国，28日抵达香港；3月4日与袁同礼先生同赴上海，12、13两日将甲库善本转运至公共租界内英国人所办美术工艺品公司的库房，随后即在该公司租赁房屋，选择装箱。此次装箱的结果，即为改装前的100箱。5月8日，王重民先生因海关方面的协调失败，离沪赴美，未参与5月后两箱的装箱工作^①，因而在其向胡适先生的报告中仅提到“百箱”^②。袁同礼先生也在5月中旬抵达香港^③，离沪时间当晚于王重民先生，期间可能指导了另两箱善本书的装箱工作^④。

1941年5月补入的两箱善本书的装箱清单全文如下：

第一百零一二箱

沈司成先生集 明万历刻本 十册

续文献通考 凡二百五十四卷 明万历刻本 一百册

古今事文类聚 明刻本 八十册

唐律多师集 抄本 六册

论语笔解 明刻本 一册

竹书纪年 明刻本 二册

嘉靖浙江通志 明嘉靖刻本 二十册

明道编 明嘉靖刻本 四册

读书札记 明刻本 一册

读书续记 明刻本 一册

鹤鸣集 明万历刻本 一册

①《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中“其不在此单者，已由王重民先生将其第一册分置各部书内”一句，说明王重民先生是前一百箱的主要清点、装箱人员，间接说明他并没有参加后二箱的装箱工作。

②以上有关王重民活动的叙述均见王重民1941年5月致胡适的报告（《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522-524页）。

③袁同礼5月20日致函胡适，署“五月廿日香港”，可见袁同礼最晚已于当日抵达香港。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522页。

④如上文所述，袁同礼1942年10月27日致教育部的密呈中称“共计分装一〇一箱”，其数字虽然不确切，但多于一百箱。所多出者，即后装的两箱。这也可以佐证，袁同礼参与了续增两箱图书的决策与操作过程。

万历昨城县志 明万历刻本 一册
 埭川识往 明抄本 一册
 嘉靖淇县志 明嘉靖刻本 二册
 李元宾文集 抄本 一册
 践祚篇集解 元刻本 一册
 文选 北宋刻本 一册
 元史 明刻明印本 十四册
 两朝典故编年考 清初抄本 三十八册
 宋书 宋刻元印本 三十一册
 大明一统志 明刻本 四十册
 御制大诰 明刻本 一册
 石林燕语 明正德刻本 一册
 周礼 宋刻本 一册
 东坡先生奏议 宋刻本 一册
 前汉六帖 宋刻本 一册
 册府元龟 宋刻本 一册
 大唐西域记 宋刻本 一册
 翻译名义集 宋刻本 一册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宋刻本 一册
 皇朝文鉴 宋刻本 一册
 宋史岳飞传 元刻本 一册
 通志 元刻本 一册
 妙法莲华经玄义 元刻本 一册
 西夏文华严经大字本 元刻本 一册
 西夏文佛经小字本 元刻本 一册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元刻本 一册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元刻本 一册
 崇古文诀 宋刻本(元刻?) 一册
 注唐诗鼓吹 元刻本 一册
 国朝文类 元刻本 一册
 华夷译语 明洪武刻本 一册
 大明一统志 明天顺刻本 一册
 五伦书 明正统刻本 一册
 大明仁孝皇后内训 明永乐刻本 一册
 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 明永乐刻本 一册
 算法全能集 明初刻本 一册
 忠经 明嘉靖刻本 一册

大明万历十九年辛卯大统历 明万历刻本 一册
王西楼先生野菜谱 明万历刻本 一册
异鱼图赞 明嘉靖刻本 一册
明本大字应用碎金 明刻本 一册
古文渊鉴 清康熙内府刻本 一册
劝善金科 清康熙内府刻本 一册
钦定词谱 清康熙内府刻本 一册
徐仙翰藻卷十二至卷十四 明抄本 一册
承天大志 明内府抄本 一册
金策御典文集 明内府抄本 一册
御制金策大斋章表 明内府抄本 一册
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明抄本 一册
新编对相四言 明刻本 一册
修文记 明刻本 一册
天问图 清初刻本 一册
万寿盛典初集 一册 清康熙刻本

以上共计一百零二箱二千九百五十四种二万零九百七十册

民国三十年五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管员李耀南编造
据上列清单,第一零一、一零二两箱共装善本书 64 种 399 册,其中大部分
每种仅有一册。

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份 1947 年 10 月 16 日吴光清先生等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信函,谈及此批寄存善本古籍。此函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专用稿纸打印,落款处有吴光清(K. T. Wu)、B. A. CLAYTOR、Mabel M. LEE 三人^①的签名。原函件全文如下:

The undersigned have carefully checked and packed the rare book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in 102 boxes, and have found that the at-

①吴光清,字子明(1905-2000),1927 年秋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1930 年获美国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奖学金,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图书馆学,1931 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入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学系,1932 年获硕士学位。1932 年任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1935 年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兼编目部主任。1938 年获洛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奖励,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实习。1941 年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44 年毕业后,继续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主管中文参考及编目业务,1966 年升任东方部中韩组主任,1975 年退休(参见:钱存训《吴光清博士生平概要》,《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 年第 3 期)。Mr. B. A. Claytor 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首任主任恒慕义博士(Dr. Arthur William Hummel)的助理。Mabel M Lee 生平不详,可能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职员。

tached lists of originally missing and extra books to be correct. The boxes contain no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K. T. Wu

B. A. CLAYTOR

Mabel M. LEE

OCT 16 1947

据此函,当时供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吴光清、Claytor、Lee 三人仔细检核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102 箱善本书,并重新装箱;他们发现部分善本书原无装箱清单(即 101、102 两箱),另有部分清单上没有的书;他们强调,这些书籍中没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品。

此函附有两份复写清单:其一为《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著录书籍等 25 种;其二为《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著录书籍 41 种 41 册。清单原文如下:

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

(原无书单)

1. 沈司成先生集. 明万历刻. 十册.
2. 续文献通考. 明王圻撰. 共十函, 一百册. [明万历刻本.]^①凡二百五十四卷.
3. 古今事文类聚. 宋祝穆编. 共十函, 八十册. [明刻本.] 凡二百十九卷.
4. 唐律多师集. 抄本. 六册.
5. 论语笔解上下卷. 一册.
6. 竹书纪年. 卷上下. 明范钦订. 二册. [明刻本.]
7. 嘉靖浙江通志. 明嘉靖刻. 二十册.
8. 明道编. 明黄绾著. 嘉靖刻本. 一夹板. 四册.
9. 读书札记. 卷一至八. 一册. (嘉靖甲午). [明刻本.]
10. 读书续记. 一册 (嘉靖乙未). [明刻本.]
11. 鹤鸣集卷之二十一. 明刘伯燮撰. 一册. [明万历刻本.]
12. 万历胙城县志. 明万历刻. 存一册. 一函.
13. 埭川识往. 明抄本. 一册. 一函.
14. 嘉靖淇县志. 明嘉靖刻本. 二册. 一函.
15. 李元宾文集. 抄本. 一册. 一木盒.
16. 践祚篇集解. 王应麟撰. 一册. [元刻本.]
17. 北宋刻文选. 一册.
18. 元史. 明刻明印. 存十四册.

①方括号中文字为铅笔书写,当为北京图书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核对目录时所加。下同。

其内容均为版刻及册数,系补足原著录所缺漏的信息。

19.两朝典故编年考.三十八册.[清初抄本.]

20.宋书.宋刻元印本.六函.三十一册.

21.大明一统志.四十册.六函.[明刻本.]

22.御制大诰.明刻.一册.一函.

23.石林燕语.明正德刻本.一册.一木盒.

注:23,24应在第一至一百箱内,但不在原单内,因提出另置一零一及一零二箱.

24.摄制国会图书馆藏书二种,胶片一卷.

25.Army Map Service及其他机关印行地图共五大捆.

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

(分装第三十九及五十三箱内,其不在此单者,已由王重民先生将其第一册分置各部书内)

2.周礼.存一册.宋刻本.一木盒.

4.东坡先生奏议.存一册.宋刻本.一函.

7.前汉六帖.存一册.宋刻本.一函.

11.册府元龟卷第三百七.一函.[一册,宋刻本.]

12.大唐西域记卷九.一册.[宋刻本.]

13.翻译名义集四.一册.[宋刻本.]

14.宋槧大藏经残本精品(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存一册.宋刻本.一木盒.

15.皇朝文鉴卷卅二.一册.[宋刻本.]

20.宋史岳飞传.元刻本.一册.一木盒.

21.通志(前汉纪五卷下).一册.[元刻本.]

28.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九.一册.[元刻本.]

西夏文

30.华严经大字本.一册.[元刻本.]

31.佛经小字本.一册.[元刻本.]

3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一册.宋[元]刻本(大字本).

33.佛经小字本.一册.(金光明最胜王经典).[元刻本.]

34.宋版崇古文诀.首册.一册.

35.注唐诗鼓吹.存一册.元刻本.一函.

36.国朝文类卷四十七.一册.[元刻本.]

37.华夷译语.明洪武刻.一册.一函.

41.大明一统志卷十一之十三.一册.[明天顺刻本.]

44.五伦书卷之卅三.一册.[明正统刻本.]

45.大明仁孝皇后内训.明永乐刻.一册.一函.

46.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甲集一之二.一册.[明永乐刻本.]

48.算法全能集.一册.[明初刻本.]

49.忠经.明嘉靖刻.一册.一函.

50.大明万历十九年辛卯大统历.明万历刻.一册.一函.

53.王西楼先生野菜谱.明万历刻.一册.一函.

58.异鱼图赞.明嘉靖刻.一册.一函.

62.明本大字应用碎金.明刻本.一册.一函.

70.古文渊鉴卷一.御选.一册.[清康熙内府刻本.]

71.劝善金科卷首一册.[清康熙内府刻本.]

72.钦定词谱.一册.[清康熙内府刻本.]

73.徐仙翰藻卷十二至卷十四.一册.[明抄本.]

74.承天大志卷卅六,礼乐纪一.一册.[明内府抄本.]

77.金策御典文集.明内府抄本.一册.一木盒.

78.御制金策大斋章表.明内府抄本.一册.一木盒.

79.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存一册.明抄本.一木盒.

83.新编对相四言.明刻本.一册.一函.

97.修文记.明刻本.一册.一木盒.

99.天问图.清初刻本.一册.

100.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一.一册.[清康熙刻本.]

将上列两个列表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中所载录的“第一零一二箱”的清单比勘,可知二者基本一致。其差别仅在于:上列《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的24、25两项,未出现在1941年5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中。这两项是:“24.摄制国会图书馆藏书二种,胶片一卷”与“25.Army Map Service 及其他机关印行地图共五大捆”。Army Map Service 为美国陆军制图局,这两部分当即王重民先生等人在美国为北平图书馆采访的文献,与运美善本一起庋藏,因而出现在清单中。

也就是说,吴光清先生等检核之后发现的原清单未著录部分善本书,除胶片一卷及地图五捆之外,实即1941年5月李耀南先生等人补装的第一零一、一零二两箱。这也说明,当时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寄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仅为前一百箱的清单;补充后二箱之后的完整列表,仅北平图书馆留存有一份。这也是吴光清等专函告知北平图书馆运美善本书中有原无清单者的原因所在。

这份书目清单经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吴光清等两轮检核,当能如实反映当时装箱善本书的情况,考察北图运美善本书种数、册数及细目,应以此列表著录为基本依据。

吴光清先生寄回的清单,还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其一,第一零一、一零二两箱所装之物,为《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所

著录的善本书 23 种 358 册,与胶片一卷及地图五捆;另 41 种 41 册,分装在第 39、53 两箱,而并非如 1941 年 5 月补充清单所称,均装于第一百一、一百二两箱内。

我们注意到,1941 年李耀南先生等人所补充的第一零一、一零二两箱清单,并未遵循前一百箱的体例,每箱单独著录,而将其全部列入“第一百零一二箱”名目之下。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事出仓促,无暇重新誊录改编第三十九、五十三箱目录,故而将其全部笼统记录于全部列表之后。

据李耀南先生等 1941 年 5 月所统计,运美善本书共计“一百零二箱二千九百五十四种二万零九百七十册”,合每箱约 200 册。《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著录的善本书为 23 种 358 册,加上胶片一卷及地图五捆,其体量差不多可以装满两箱。《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著录的 41 种 41 册中,有 7 种有木盒,12 种有函套,体量相对较大,很可能无法装入第一零一、一零二两箱。又据《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装箱目录》,第三十九箱原装 9 种 89 册,第五十三箱原装明嘉靖刻本《文献通考》1 种 100 册,剩余空间较大,足以装下《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著录的 41 种 41 册。由此推测,吴光清等函所述的情况应该是 1941 年 5 月增补装箱时的实际情况,即有 41 种 41 册被补装入第三十九、五十三两箱。

其二,据《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的著录及其说明,当时北平图书馆寄往美国国会馆的善本书中,不仅有避祸寄存的甲库善本精品,而且另有部分为一次善本书展览的展品。这一信息是解决相关问题(尤其是“有书无目”部份)的关键所在。

三、关于古籍展览及其书目

吴光清先生等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清点运美善本书后,寄回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100 箱列表以外书籍列表中,有《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一份,其全文已见上述。这份清单揭示了一件久被遗忘的事件:1941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曾经筹备合作举办一次中国古籍展览。

《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的编号至 100 号止,由此推测,北平图书馆为此次展览提供的展品大约即为 100 种。《展览书单》列出 41 种 41 册,可见每种展品计划展出一册,且多为其“第一册”。据书单中所注“其不在此单者,已由王重民先生将其第一册分置各部书内”一语,此外约 59 种展品,即在当时运美善本书之内。

《展览书单》所列 41 种古籍,集中于 1941 年 5 月补入的,“分装第三十九及五十三箱内”,可见 1941 年 3 月装箱时,并未确定展览的相关事宜;而至 5 月改装之时,展览事宜已经确定,展品目录也已选定。因此可以推知,此次展览的整体规划,是在 1941 年 3 月至 5 月之间确定的。

这批展品图书的装箱,可能较为仓促。大约本拟装入新增的 2 箱内,因而

列入第一零一二箱的清单内;但由于这两箱空间不足(如上文所述),遂将它们置于空间富余较大的第39、53两箱内,而装箱清单则来不及进行修改。

由于《展览书单》未列出全部展品目录,我们无法了解该次展览的全貌。下面仅就《展览书单》所列的41种古籍,略作归纳整理,藉以窥得该展览的一斑。

就版刻年代而论,有宋刻本9种,元刻本9种,明刻本13种,明抄本5种(其中内府抄本4种),清初(雍正以前)刻本5种;就文种而言,除汉文外,尚有4种西夏文刻本;就内容而言,经史子集四部书均有选入,佛道二教文献共计11种,版画则有《异鱼图赞》、《天问图》、《万寿盛典初集》(选入的卷四十一为连环版画)等3种,此外,《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为彩绘本,素以装潢精美著称。从这几个方面看,此次入选的展品富于代表性,当能基本反映中国古籍版刻的发展历程。由此可见,规划中的这次古籍展览,其关注的重点可能即为中国古籍的版刻及其发展史。

此次展览当为中国图书馆界在海外筹办的第一次中国古籍展览,应当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对外交往方面值得纪念的事件。遗憾的是,现在所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很少,国家图书馆旧档案中,也没有发现与此次展览有关的文件、信函或选目文档。

四、对昌彼得先生质疑的回应

昌彼得先生在《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一文中,对善本运美的过程及清单提出诸多质疑。综合考察种种史料可知,昌先生所提出的种种质疑,绝大部分实属误解。之所以产生误解的原因,是相关史料未能及时披露,使得昌先生立论的资料依据不够充分。

运美清单未著录第101、102箱的问题,已见上文,兹不赘述。这里试就此外的其他问题,逐一剖析如下:

其一,关于存沪善本的典藏与运归北平。

善本运美的消息披露之后,引起日伪的重视。日伪任命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周作人遂派遣秘书主任王钟麟(古鲁)南下上海,检视存沪善本书,并于1942年11月3日、12月16日分两批运回善本书128箱,其中甲库书1503种、乙库书591种。此次运回北平的善本书,国家图书馆档案中存有列表,此外另有俞涵青所编《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一册,1943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铅印。

王钟麟1942年运回北平的善本书,是平馆南运善本书中最早回到北平的两批。昌先生认为,“平馆未运往美国而遗留在上海的甲库善本八百多种,照说应该在这次运回北平去的”^①。事实上,1942年运回北平的善本书,并非平馆存沪善本书的全部;平馆存沪善本回迁北平,也并非只有1942年的一次。

抗战胜利之后,北平图书馆于1945年10月复原,陆续将抗战前转移到上海、香港等地的藏书回迁。其第一批24箱(包括部分抗战期间新购善本),于1947年8月9日由上海办事处委托中国旅行社运回北平^②。

编制于1949年的“平馆善本书统计表”,列有“胜利后回馆善本书”一项,记载:“善甲书五百二十五种,三千一百七十二册;善乙书二百五十九种,二千五百七十五册;共计七百八十四种,五千七百四十七册”^③。

1949年12月17日,赵万里先生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前往上海,其主要任务之一,即为清点存于震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的图书,装为208箱,安排北运回馆,并结束上海办事处的工作^④。

王钟麟1942年未发现的存沪善本书,即在1947至1950年之间陆续迁回。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档案中,尚存有历次回迁的装箱清单。

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初以前回迁至北平的善本书,并未编为目录公开发行,因此详情不为世人所知。而195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主要收录1949年以后北图新收的善本书,兼收1937至1948年入藏善本书,并未囊括抗战前南迁并于抗战胜利后运回的善本书^⑤。也就是说,综合1943年《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与195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非北图当时存藏善本书的全部。昌彼得先生依据这两种目录,将其与1933年善本甲库目录对照,进而推测善本甲库的部分藏书已经流散,论据显然不足。

存沪善本的典藏情形,是昌先生质疑众多善本书下落的出发点。他发现,1942年运返的书中,史子集三部书均有,而没有经部书,因此推测:“经部的书当时可能单独放置一处,故未被发现。史、子、集三部的书,照我们的经验,应当是放置在一起的。尤其平馆善本的复本颇多,不可能同一部书的几部复本,而分别放置几处地方。所以说那下落不明的五百多种,假若不是在上海被特别隐匿,那就是在运返北平后出了问题。”^⑥

诚然,存沪善本详细准确的储藏情形,我们至今无法准确地描述。不过,我

①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453-454页。

②据装箱列表《善本图书装箱簿》封面标注。原件存国家图书馆1949年前旧档案“采藏9”。

③统计表原件影印本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1103页;整理本见:《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④邹文萃集辑:《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⑤此目《编例》第一条即为收录范围的说明:“本编所收,以建国十年来新入藏书为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陆续收入之书,亦随同编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华书局,1959年,第1页)

⑥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454页。

们依然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看到当时的概貌。随着战争局势的转变,抗战期间平馆存沪善本书曾经多次转移,这是现今我们共知的事实^①。颠沛流离的环境下,皮藏的秩序未必严整,史、子、集三部书,当时必定不在一处。而同一部书的不同复本,也有意分散放置。即以1947年8月运回北平的24箱善本书为例,其中有宋刻本《后汉书》5种,分装第14、21、21、21、23箱,而宋刻本《魏书》3种,分装第1、4、4箱^②,均未放置一处。其他史部、集部书错杂装箱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此分散放置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分散藏书面临的风险。战乱时期的特殊处置,或许与太平年代从容不迫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点不能作为质疑存沪善本下落的依据。

其二,关于运美清单中有目无书的11种善本书的下落。

昌彼得先生等于运美善本书迁台之后,进行清点,发现有目无书者11种:内中抄本《两宋名贤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摄制缩微胶卷,系抵美后遗失;元刻《两汉诏令》民国三十一年已运回北平,未装箱运美;其他九种,昌先生对其下落存疑^③。经核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④,这九种善本书均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谨将昌文所列九种图书的列表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对比列表于下:

昌文所列清单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说明
《遯言》十六卷 二册 明万历刻本	遯言十七卷 明孙宜撰 明万历二十三年孙鹏初刻本 三册 十行十九字 白口左右双边 ○一四八八(1418页) ^⑤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十六卷,《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多一册一卷,当为晚近配补。
《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存三卷 一册 金刻本	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 金韩道昭撰 金崇庆元年荆珍刻本 四册 十三行小字约三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 存十二卷 一至十二 ○三八(191页)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存三卷(一至三),《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多三册九卷,当为晚近配补。

①详情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的相关章节。

②《善本书装箱簿》(1947),原件存国家图书馆1949年前旧档案“采藏9”。

③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448-449页。

④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⑤说明:本条及以下条目原文录自《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每条之末扩注该书页码,以便查核;原文大号字加粗,小号字不加粗;每条最后一项数码为北图馆藏号,首位为“○”者表示该书为1949年以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

(续表)

《锦里耆旧传》四卷 二册 抄本	锦里耆旧传八卷 宋勾延庆撰 清抄本 黄丕烈校并跋 二册 九行二十字无格 存四卷 五至八 〇一〇六 (312 页)	二者著录相同。唯前者“四卷”当作“存四卷”。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 二册 抄本 以上两种均有黄尧圃批校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 宋欧阳忞撰 清抄本 周锡瓚、黄丕烈校并跋 二册 十三行二十四字无格 〇一一二 (538 页)	二者著录相同。
《万历杭州府志》一百卷 二十册 明万历刊本	[万历] 杭州府志一百卷 明刘伯缙、陈善纂修 明万历刻本 [卷一卷十九配抄本] 二十一册 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 存七十九卷 一至十九 二十四至四十五 五十三至七十九 八十一至九十一 〇一三五五 (669 页)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一百卷,《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多一册,当为晚近配补。
《释药集韵》存一卷 一册 明嘉靖刊本	释药集韵二卷 明程伊撰 明嘉靖刊本 一册 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 存一卷 上 〇一四五— (1251 页)	二者著录相同。
《太史屠渐山文集》四卷 四册 明万历刊本	太史屠渐山文集四卷 明屠应峻撰 附录一卷 清初刻合刻屠氏家藏二集本 四册 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 〇一六六八 (2368 页)	版刻著录不一。《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太史屠渐山文集》仅此一种,《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者即该书无疑。版刻著录的差异,盖因晚近编目重新考定。
《王椒园先生集》四卷 四册 明万历刊本	王椒园先生集四卷 明王纳言撰 明万历三十九年王凤征刻本 四册 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 〇一六七四 (2368 页)	二者著录相同。
《邓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四册 明刊本	邓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明邓以讚撰 明周文光刻本 四册 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 〇一七一— (2403 页)	二者著录相同。

如上表所示,其中 4 种著录相同;1 种存卷著录略有差异;1 种版刻著录不一致;另 3 种《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较昌文所列清单卷数、册数更

多,其原因当为晚近另有配补^①。据此可知,昌文所列清单中的九种善本书,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未曾有过闪失。

对于这十一种善本没有装箱运美的原因,钱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附记迁台经过》中有过推测:“其中有目无书者 11 种,……大概为当年选装原定一百箱,临时增入 2 箱,或有抽换,因时间紧迫,目录未及改正,忙有有错,亦属可能。”^②这是最为接近事实的解释。

其三,关于 1942 年王钟麟未运回的存沪善本甲库书五百余种的下落。

昌彼得先生发现 1942 年王钟麟未运回的存沪书中有甲库善本五百余种,遂发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一文,罗列 573 部^③。昌先生说:

所以说那下落不明的五百多种,假若不是在上海被特别隐匿,那就是在运返北平后出了问题。五百多部至少有好几千册书,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精品,假若果真留存上海办事处的话,三十八年中央政府撤离大陆时,相信一定会把它携运出来。平馆留存的明清舆图十八箱,当局尚未忘记运来台湾,当然更不会把数量较多且更珍贵的善本精品让它沦于匪手。因此笔者揣测那些善本不在卅一年运返北平后失了踪迹,就是在上海时早已化整为零了。^④

这一段话,实属误解之词。如上文所述,抗战胜利后至 1949 年初,回迁北平的善本书有 784 种 5747 册;1949 年 12 月赵万里先生赴沪清点图书,又运回 208 箱。昌文所罗列的 573 部善本书,即在这一时期陆续回到北平。上文所引“胜利后回馆善本书”中的“善甲书五百二十五种,三千一百七十二册”,其种数与昌先生所列基本符合,即是明证。

以宋刻本为例,1947 年 8 月 9 日运回北平的第一批 24 箱中,就有昌文所列 36 种中的 17 种,即《汉上周易集传》(第 20 箱)、《大易粹言》(第 20 箱)、《周礼》(第 21 箱)、《京本春秋左传》(第 20 箱)、《监本春秋谷梁注

①残本配补,乃是图书馆常用的藏书整理方法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二、四号连载《本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表》(后者署《本馆新旧善本书目异同表》),揭示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3)与夏曾佑《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1916)的异同,对各残本的配补情况有详细说明。署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以北图藏《魏书》为例,通过多种书目、经眼录的比对,分析了其调整配补的过程,对这种整理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个案探讨,很有参考价值。与《魏书》相似,北图的其他善本残本,多有调整配补的历史。《出版说明》认为:“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以后,这些善本书再也没有经过大规模调整配补等变化。”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属实,1933 年之后北图历次所编善本书目显示,类似的调整配补在此后也并不少见。

②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附记迁台经过》,第 74 页。

③昌彼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第 457—484 页。

④昌彼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第 454 页。

疏》(第20箱)、《春秋集注》(第20箱)、《汉书》(第17箱)、《后汉书》(2种,分装第14第21箱)、《三国志》(第14箱)、《南齐书》(第14箱)、《魏书》(3种,分装第1、第4箱)、《锦绣万花谷》(第2箱)、《欧阳文忠公集》(第2箱)、《西山真先生文集》(第21箱)^①。

检核1988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这五百余部绝大多数均著录在册。仅以宋本为例,昌文列举出37种,其中32种著录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内有6种所存卷数、册数较昌文所列为多,可能晚近有所配补;《春秋集注》、《魏书》(存九卷)2种虽不见于1988年的《善本书目》^②,而见于1947年8月运归北平善本书清单;另3种待核。金元本、明本、稿本、抄本各类,情况亦大致相同。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绝大部分存沪善本书都已经在1949年前回到了北平,这也是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时未能将这些善本书带走的重要原因之一。

昌先生又从大陆图书馆出版的善本书目中,检寻出《湖广总志》、《襄阳府志》、《云门志略》三种,作为“似乎是失踪的平馆善本”的例子,试图坐实“这些下落不明的善本,很可能有些化公为私了”的猜测。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三个例证:

这三种中,《湖广总志》、《襄阳府志》两种系昌先生于195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得之,因而怀疑这两种是北平图书馆旧藏而被人“售出”者。须知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49年9月27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再次更名为北京图书馆^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负责整理善本甲库藏书的,为赵万里先生;1949年之后负责北图善本古籍采访、编目工作的,仍为赵万里先生。以赵先生对古籍版本及本馆藏书的熟悉程度,岂有盗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藏书,转售予更名后之北京图书馆,而不为其察觉之理?

昌先生对不同目录所著录的善本书的认同,也不无疏忽之处。如《湖广总志》一书,昌先生比对1933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与195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后,将其中二种混为一谈,并说:“罕有如此凑巧传世的两部残本,残存的情形一样,故笔者推测必是将平馆旧藏本留下前面的三卷、后面的六卷,而以中间的售出”^④。检1988年《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万历]湖广总志》著录三部。其中馆藏号为“一一六四九”的一部,残存十三卷,即昌先生所指被窃后掐头去尾转售予北京图书馆者;馆藏号为“〇一三五〇”的一

①据装箱清单封面标注。原件存国家图书馆1949年前旧文件“采藏9”。

②1988年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也并未著录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所有善本书,因此未能查到这两种善本的相关信息。

③邹文萃集辑:《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第40、44页。

④昌彼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第455页。

部,著录为“[万历]湖广总志 明徐学谟撰修 明万历二年至四年刻本 二十六册 存四十三卷 四至十四 十九 二十三至二十四 三十六至五十八 六十至六十四 七十五”^①,此书存卷能完全涵盖 1933 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著录者,另较其多二十一卷(卷四至十四、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六至四十九、五十一),编号以“〇”开头,当即为同一书而经配补者。

另一种明万历刻本《云门志略》,北平图书馆所藏残存卷一至卷三计三卷,昌先生于 1957 年上海图书馆铅印的《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发现著录有残存卷帙相同的一种,遂认为“大有可疑”,怀疑平馆藏书已流入上海图书馆。然检 1988 年《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赫然著录有该书:“云门志略五卷 明张元忭撰 明万历二年释司纶等刻本 一册 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 存三卷 一至三”,馆藏号标注为“〇三九二”^②。显然,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分别藏有《云门志略》残本前三卷,而北京图书馆藏本无疑继承自国立北平图书馆。昌先生据二馆书目著录相近即怀疑其来路,立论有失于严谨。

昌彼得先生说:

因之笔者对现在运回台湾来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是否就是当年运到美国去寄存的全部?实深致怀疑。那失踪的五百多种善本,都是国宝,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凡我国民都有权利想知道它们的下落。当年主持的人,袁同礼馆长已经故世,而实际从事选书装箱工作及在美典管的王君现在还在大陆,有责任把当年的实在情形作一报告。尤其为了个人的清白,更应该表白,指出失踪善本的下落。^③

这一段话,直接质疑王重民先生在上海选书装箱及在美国负责典藏的过程中监守自盗,读之殊令人有骨鲠在喉之感。如上文所述,在确切无疑的事实面前,这些质疑顿时冰释无遗。

其四,关于增补书中多为一册残本的问题。

昌先生文中说:

这没有目录的三十六种书中^④,有宋版九种,元版七种及明清刻本若干。这几种宋元版,除了宋版《文选》是两册,其余都是一册残本。如宋刻《大唐西域记》,平馆所藏十二册全,而运出只第九卷一册;如《皇朝文鉴》平馆藏有六十五册,而运出的只有第卅二一册;如《崇古文诀》平馆藏十七卷,而运出者只第一卷序与目;如元版《国朝文类》平馆藏有残本廿

①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 705 页。

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 789 页。

③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 456 页。

④昌彼得先生在此举出的装入第 39、53 两箱种的书籍种数为 36 种,与吴光清等所列清单中的 41 种不符,这一差异可能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缩微胶卷时,将这两箱内的部分书按照清单移至第 101、102 箱所致。推想当时情景,可能移回数册之后发现 101、102 箱空间太满,遂没有全部移回,因而仍有 36 种置于 39、53 两箱中。

二卷,而只运出第四七、四八两卷一册;如明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平馆藏六十卷,而运出只第十一至十三卷一册;如正统本《五伦书》平馆藏六十二卷全,而只运出第卅三卷一册;如明内府写本《承天大志》平馆藏有三卷,而只运出第卅六卷一册。此例尚多,无须缕述。一书之当放置一处,不使拆散,虽幼儿亦知为之。以当日负责诸君之博通,竟有此等之事,诚令人百思不得其故。^①

此处所举出的多种善本,平馆均有全本或多册残本,但均仅运美一册。检上文所揭《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单中所有古书,均为每种一册。这是因为举办版刻展览,无须全书多册全部展出,以一册示意即可。只要了解了这批书运美的目的是展览,则昌先生“百思不得其故”的疑问,立刻迎刃而解。

了解这批书作为展览展品的性质,还可以解决昌彼得先生所提出的更多疑问。如:

还有装箱清册所未刊载而运回台湾的书,有清代殿本《古文渊鉴》、《劝善金科》、《万寿盛典初集》、《御制词谱》四种残本,及清刊《天问图》一册,这根本不是北平图书馆的甲库善本,在平馆善本书目中没有著录,就是在现在也还未达善本的标准。……不知道当年竟何以费那么大的事,远渡重洋,运到美国去保存?这也是叫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②

清代殿本虽在当时不够善本的标准,但毕竟为有清一代刻书的佼佼者,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版刻水平,故而选入为展品;《万寿盛典初集》所选入者为第四十一卷,是该书两卷版画之一,其版画稿本为宋骏业所创,由王原祁、冷枚等修润完成,刻版则出自著名刻工朱圭之手,甚为精丽,而《天问图》版画出自清初名家萧云从之手,二者均为清初版画的代表作,故而选为展品运美。只要了解了它们作为展品的用途,那么当初远渡重洋将不够善本标准的《天问图》等运到美国,就并非“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昌彼得先生之所以对存沪五百余种善本书的下落、对运美清单中的某些问题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未能及时公布,且当时两岸阻隔不通,难以获得相关信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史料公之于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大致看到平馆善本运美迁台经过的大部分细节,因此可以澄清多年来对国难方殷之际冒险保护国宝的袁同礼、徐森玉、王重民、钱存训先生等当事诸公的论据不足的质疑,还其清白。

五、余论

通过挖掘相关档案史料,比勘各种目录的著录,上文厘清了有关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善本书的部分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细节问题。但是,由于资料仍然

^①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456页。

^②昌彼得:《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第456页。

缺乏,我们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与一事件相关的所有问题。比如:

其一,关于运美善本书中有书无目的 24 种 126 册的下落。

昌彼得先生比对缩微胶卷目录与运台书目,发现有 24 种 126 册运美善本书清单中没有列入,也没有运达台湾。但既然美国国会图书馆曾为摄制缩微胶卷,其下落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方面入手追寻。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之前,不妨暂时存疑。

其二,钱存训先生多次提到^①,1941 年最后一批运美善本书,原定由“哈里逊总统”号运送,该船当年 12 月 4 日由马尼拉赴秦皇岛,在距上海吴淞口外为日军俘虏,征用作军事运输船,直至 1944 年 9 月 11 日被美国潜艇击沉。而这批善本书竟安全抵达美国。钱先生推测,最后一批书可能由其他船只运送。其中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些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辨析,请俟诸异日。

后记:本文草成,惊悉昌彼得先生仙逝噩耗,不胜震恻。半个世纪前,昌彼得先生检核平馆运美迁台善本,对其中几个问题提出质疑。这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的严谨与认真,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责任感,让我们深为感动。2009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昌先生的文集《蟬庵论著全集》,两篇质疑北平图书馆运美善本的文章列在其中,可见昌先生晚年对此事仍然心存疑问。因此我们收集、整理、核对相关资料,希望能以我们的调查结果,为昌先生释疑。不料小文初成,尚未送昌先生寓目,遽然闻知先生驾鹤西游,思之慨然。谨以此文纪念昌彼得先生,缅怀他作为版本目录学家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丰功伟绩。2011 年 10 月 17 日识。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附记迁台经过》,第 72-73 页;《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第 19 页。